

扶余文史资料

(6)

扶余县政协文史办

目 录

- 一、记在扶余、农安一带剿匪的战斗经历…陈伯青（1）
- 二、清末以来至伪满期间的扶余工商界……高俊峰（9）
- 三、我所知道的“增盛永” ……………吉竹友（29）
- 四、高句丽出于夫余……………杜 宇（49）
- 五、扶余历史庙宇……………张功颀（53）
- 六、征稿启事……………（67）

记在扶余、农安一带剿匪战斗经历

陈 伯 卿

一九四八年的九月、十月间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，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，由战略防御转为全面战略进攻，整个形势对我方非常有利。我东北大军为了诱迫死守长春的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弃暗投明，举行起义，对长春实行了长期的战略包围。

来自扶余一带的匪情情报

蒋介石为了挽救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命运，在近沈战役备战时期，一方面下令卫立煌不惜任何代价固守长春、沈阳、锦州军事重镇外，另一方面网罗地主武装、特务、土匪在我后方大肆进行破坏活动，企图扰乱我社会秩序，阻止我军急转南下，打乱我军的战略布置。尤其在长春外围我军前沿阵地周围一些区域，隐蔽的敌人和土匪的活动甚为猖獗。死守长春孤城的郑洞国，看到我大军兵临城下，牢固地包围住长春孤城，使长春断绝了物资外援，动摇了军心，所以他一方面指示反动地主起来组织武装叛乱，另一方面又派出原伪警察、宪兵、特务投靠国民党的军、政人员，化装出城，

网罗地方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组成一股股武装匪队，向我解放区军、政机关，物资仓库以及农会民兵队部进行破坏和捣乱。当时不但对我解放区军、民支援前线工作影响很大。而且使人命财产遭受了很大损失。我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，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破坏阴谋，开始命令松江省军区独立七团出发去吉林德惠、农安一带，消灭所有这些扰乱破坏的土匪武装，收到很大效果。敌人感到以小股武装与我军对垒形势不利，于是又采取化零为整，将若干小股匪帮合成大帮同我军对抗。当时，由于对敌情况掌握不够，致使松江军区派出剿匪的友军一个排，在农安县境靠山屯遭受到土匪的偷袭，造成较大伤亡。由于匪徒对靠山屯偷袭的得手，更加助长了嚣张气焰，破坏活动愈来愈加猖狂，扰乱破坏的范围越来越大，有的甚至窜到松花江北岸我老解放区扶余县境内进行袭击抢掠。一九四八年七至十月仅三个月时间，活动在农安县境的土匪武装竟三番五次渡过松花江，深入到扶余县境内，对我地方政府和民兵组织进行突然袭击，打死打伤我民兵多人，抢掠去大批财物，有时甚至对在农田劳动的农民进行打骂和绑架。

出兵扶余县境

我嫩江省委和省军区（扶余当时归嫩江省），根据扶余县的报告，经请示东北军区批准，及时决定责成我警卫一团派出相应的剿匪部队前赴扶余，协同松江省剿匪部队，消灭盘踞在长春外围一带的所有土匪，确保解放区的支前，顺利解放长春。

我警卫团接受上级剿匪命令后，开始对敌情了解不够，经团党委研究决定，先从一营抽调两个连和一个机炮排作为

先遣部队到扶余，以副团长王长庚同志，政治股长彭方俊同志和我组成临时指挥机关，由我负责全军的后勤供应。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一天夜晚，从齐齐哈尔乘专用列车，经由哈尔滨，次日黎明直达三岔河车站下车。由于长途夜间行车，战士们都很疲劳，但兵贵神速，部队在三岔河没有休息，立即整装徒步向五家站进发。副团长命我将所带军需物资随即押运到五家站，我经过估算所带物资要一次拉运目的地，至少需要八台胶轮大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好到三岔河区求助于地方政府。未料，接待我的一位姓谢的副区长，因我不便泄露军事秘密，只当我一般平常用车，借口农忙拒绝给车，虽经我再三好言相求仍不奏效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从三岔河打电话找县委书记黎南同志。当他知道我是军区警卫一团的成员和得知部队已经向五家站出发时，对我的处境也很着急，并立即找这位谢副区长接了电话，我只好耐心等待。但这位区领导还是不慌不忙的，既不给车，也不拒绝，把我急的团团转。正想再次给县打电话时，听到门外汽车喇叭声，随后走进一位中等身材，体质稍胖，年令在四十岁左右的一名干部，这时区工作人员赶忙迎上前去，称呼韩县长。进到区领导办公室，这位领导就立即接见了，他自我介绍叫韩立忠，首先向我道歉。当问明情况后，他即刻召开区干部会议，对所需的车辆作了严肃的工作布置。傍晚五时左右装车完毕，我才连夜将物资安全运到目的地。对扶余县委和政府这样重视和支持，使我十分感动。

进驻五家站

部队从三岔河出发，徒步行军五十华里，到达扶余县五

家站区所在地。由于部队到达之前，扶余县党政领导已给五家站区党政机关通了电话，所以食宿安排十分顺利，除团的指挥机关和机炮排住在区所在地外，其他连队住在附近村屯。我负责安排各单位的食宿给养，指挥部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，周密布置了警戒，侦察等作战事宜。据五家站区党政机关的报告得知，在我们土匪部队到达五家站前一个月内，五家站区政府和民兵队部连续两次遭到土匪的夜间偷袭，屠杀我党政干部和民兵，抢夺枪支、弹药和搜刮民财，更甚者有个报号“青山好”的土匪络子，还抢掠绑架青年妇女，供匪徒们玩乐，土匪们不时埋伏在松花江岸，拦截过江客商。一次在拦截过江客商中，竟打死打伤我护送民兵四人。另据当地群众提供的情报得知，活动在农安一带的“青山好”匪帮是当地人数最多、破坏性最大的一股土匪武装，总人数多达四、五百人，成员多为伪警察、宪兵、特务和网罗当地一些地痞流氓组成的。武器装备较强，不但有轻机枪而且配有小炮。骨干多为长春遣逃出来的伪满下级军官，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。由此而知，活动在这里的土匪，不是单纯为追求财物而拼凑到一起的一股土匪，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受国民党当局支使，为国民党服务的别动队。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，对他们不得不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。当我们到达五家店驻扎不久，匪徒们即探知我部队人数不多，又缺少重型武器，所以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并且时常在松花江对岸，时隐时现进行破坏捣乱，妄图引诱我部队仓促过江，给我们以伏击，把我部队消灭在大江之中。经过我们的侦察分析，要想一举消灭这股土匪，只有两个连的兵力是不够的。为不打无把握之仗，战地指挥部命令我火速返回齐齐哈尔，向团党委作了详细的汇报，请令定夺。团党委对情况作

了周密调查分析后，报请省军区批准，决定再增调三营所属的七、八、九连，由团政治处王主任率部增援五家站。

偷渡过江

为了继续麻痹敌人，使匪徒们不知道增援部队的到达，我们后增的一营兵力，都是夜间秘密进驻宿营地的。为了不使敌人发现秘密，就连增援部队的给养也不从当地增加供应，所需吃粮都是在夜间从三岔河拉运到驻地。活动在松花江南岸的土匪，看到我们长期息兵不动，误认为我们势单力薄，不敢过江，只能在江北守卫自己的疆土。因此，他们对沿江封锁逐渐松了下来。这样对我部队偷渡过江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一天夜晚，寒风刺骨，天空出现了乌云，天黑得伸手不见掌。晚十时左右下起了蒙蒙小雨。团指挥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当机立断作出决定，命令各营、连作好渡江准备，就地待命，同时派出侦察人员深入沿江两岸侦察敌情。当夜零点左右，得到侦察报告，沿江两岸没有敌情反映，于是指挥部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发偷渡过江。江岸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现成船只共有五只，每船每次最多只能摆渡二十人，每往返一次需要三十分钟，我们近两营六个连的部队共六百余人，加备用弹药全部过江去，估计最低也得三个小时。为了缩短渡江时间，部队命令各部会游泳的指、战员，忍受寒冷的江水泅渡过江，缩短了渡江时间，争得了主动权。

朝阳沟战斗

为了一举将南江一带各股土匪武装消灭，在我们部队渡江南进的同时，即与正在南线执行剿匪任务的松江军区七团进行了通讯联系，共同制定了南北弧形包剿的战斗方案。当匪徒发觉我部队已经过江，并且南北正在拉成弧形包围圈，对他们进行步步紧逼的时候，才慌了手脚，一时弄不清我军的作战意图，在我包围圈内四处乱窜。我南北两方剿匪部队抓住这一战机，命令所有部队紧缩包围圈，最后终于将大帮土匪包围到朝阳沟。为了防止匪徒夜间突围，我们对火力配备了严密的部署。狡猾的匪徒由于摸不清我方的火力部署，不敢冒险突围，就采取四面八方向我剿匪部队进行火力佯攻，妄图以此了解我方火力布署。当我们意识到匪徒的用意之后，随即命令各部将计就计，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迷惑匪徒。当夜十一时左右，匪徒用密集的炮火作掩护，向正南方向开始突围。我部队由于事先已有预料，并重点做了火力布署，对匪徒此举丝毫未感到突然，个个沉着应战。当突围土匪进入我方火力圈之后，一声令下，枪炮齐发，数挺日式九二重机枪如火龙吐舌，大小炮齐发，把突围匪徒打的人仰马翻，一个骑东洋大马双手使两把快慢机驳克枪的匪首，看到形势不妙，喊完一声撤，马头还没有调转过来，就一头栽倒马下，活着的匪徒看到领头的已经毙命，调回头拼命往回逃跑。匪徒的第一次突围就这样被打退了。

匪徒们由于吃了我们以假乱真的亏，回头拼命向我方进行射击，当即遭到我方炮火的猛烈还击，迫使敌人不敢再轻

举妄动，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。

战斗持续了一夜，凌晨拂晓，我剿匪部队进完早饭，东方已经发白，朝阳沟已清楚的展现在眼前，匪徒们的顽抗据点和匪首们居住的地主大院院墙，以及院墙四角构筑的炮台工事已清晰可辨。为此，我剿匪联合指挥部发布了全线进功的命令。为了摧毁匪徒们的顽固工事，破坏敌人的火力部署，我团和友团各部命令炮兵对匪居穴巢进行了猛烈的炮击，土匪的火力工事已被我彻底摧毁，首匪居住的院内房屋有的起火燃烧。我军看时机已到，命令各部发起总攻，冲锋号声震天！匪首们看到大势已去，无法再进行顽抗，用枪威逼众匪徒冲开一条血路，从西北角狼狈溃逃。匪首的小老婆一看匪徒们要炮，拽着匪首的马缰绳也想上马同逃，还没上去马，即被我乱枪击伤倒在血泊之中。朝阳沟的一战，使匪徒吓破了胆。这一仗对土匪虽未达到面歼的目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，使其丧失了战斗力。经过战后查明，朝阳沟战斗共消灭匪徒四十人，缴获轻机枪两挺，步枪五十多只，我军无一伤亡。

对匪徒的全歼

溃败的匪徒从朝阳沟突围后，为了避开我南北两线剿匪部队的围歼，逃出农安县境，窜入郭尔罗斯前旗境内。我团各部为了拦截这股溃逃的匪徒，力求全歼，急令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，从五家站出发，徒步行军二百里，直达扶余县城，在扶余县城稍加休息即渡江进驻郭前旗县所在地。这时军区领导为了彻底肃清盘踞在吉林一带的匪帮，在我剿匪部队到达郭前旗不久，即命令我团改编为南线剿匪指挥部，将

团机关由齐齐哈尔移驻郭尔罗斯前旗，并任命原警卫一团团长龙小文同志任指挥，嫩江省公安厅厅长许西任政治委员，受东北军和嫩江军区的双层领导和指挥。

在我团受命改编的同时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辽沈战役接近尾声。死守长春孤城的郑洞国看到这种形势，打消了死守待援的梦想，一部宣布起义，一部投降。形势的急剧发展，使活动在吉林一带的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匪徒，如丧家之犬，纷纷向辽西方向通辽一带逃窜集结，妄图突破我辽西野战军防线，取道内蒙向京津国民党军队靠拢。我南北两线剿匪部队，一方面跟踪追击，一方面向军区领导机关报告匪徒动向，联系辽西野战军配合截击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末，当集中逃窜的匪徒八百余人，进入我辽西野战军防线后，一举被我强大的野战军部队全歼。

我剿匪部队在吉林一带的剿匪战斗，前后历时两个多月，在友军和野战军部队的全力配合支援下，取得了全歼的重大胜利，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使命。迎来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东北解放。在党中央“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伟大号召下，我南线剿匪指挥部宣告解散，全团在秦皇岛接受了改编，一部分改编为海军；其余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部，接受了进关南下解放全国的伟大使命。

清末以来至伪满期间的 扶余工商界

高俊峰

这是我所了解的扶余工商界从清末民初，一直到伪满垮台，这一阶段的活动、遭遇情况和在经济旋涡中的挣扎、以及上层人物的勾心斗角、互相倾轧等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所了解所记忆的一些事，距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，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，希望知情者给以指正。

一、扶余商业开拓、外省人聚来就业

扶余在满清时代故名伯都讷，以后改为新城府。设有民、旗两个衙门，民衙门俗称北府，最高长官是汉族人知府；旗衙门叫南府，由满族人充任，最高首长叫副都统。一直到辛亥革命后，才改为扶余县。由于扶余地处松花江中游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因而关内很多人纷至沓来，从事开拓创业。例如杂货业、质当业、以及醋酱业，大多数是山西省清源县和徐沟县人。杂货铺比较大的如“大成店”、“大成茂”是山西张家的独东；吉字号的有杂货铺，质当业，如“吉太庆”，“吉太当”、“吉发家”、“吉庆家”、以及“吉隆棧”等，都是山西邵家的财东；“永隆昌”，“永隆当”都是山西常家的独东；山西人最大的铺户、是“隆盛号”、“隆盛当”、“永盛泉”等，全是山西人王福的独东。在扶余经营中药材大部份是河南武安县人，经营屠宰业的大多数是山东武城县

人，如范廷俊、王立水、二宝、王金斗等，搞纺织业的都是山东来州府人；经营蔬菜的大部份是山东青州府博兴县人；捕鱼业（俗名网房子）都是山东省兖州府汶上县人。在航运事业上也出了一些有特色、有名望的舵工，不但驾驶木帆船，就是驾驶机动船（俗称火轮船），沿江其它各县的舵工，在技术上，都是望尘莫及。上至吉林，下至哈尔滨，富锦等地，轮船舵工大多数都是扶余人。如付明和、刘富、袁国盛、邢广祥、李秀峰、张永德、徐广森、张万宝等都是技术高、名望大、沿江驰名的大舵工。这些人在关内为生活所迫，背井离乡，来到扶余勤勤恳恳开拓创业，给扶余创造了很多财富。为扶余的繁荣昌盛奠定了深厚基础。

在民国初年，扶余人民心目中有三个大商号，“隆盛号”是山西人王福开办的；“裕来公”是榆树县于翰林的财东，资方代理人（掌柜的）是杨志国，外号杨黑塔；“成盛永”是回民赵连城的独东，所经营的商品可以说，上至绫罗绿缎、下至葱韭芥蒜。这三个商号互相竞争经营。门面修饰上，也是争奇斗胜，别开生面。“裕来公”的门面，刷的是粉红色，“成盛永”的门面刷的是洁白色，“隆盛号”门面修建，仿照俄式，全是圆柱形。因此扶余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：“裕来公”的红，“成盛永”的白、“隆盛号”修了二年，修了一个喇叭台。

另外，扶余由于松花江航运的便利、吉林很多木材商，如“成义和”、“公成信”、“聚成合”等，都是吉林李成福的财东，在扶余南西江沿，设立很多排木局子。这时扶余，已成为一个木材集散中心地。在扶余木商辉煌年代时，连野排在内，总计有一百三四十家。修洮南府，修开通县，修高尔苏官王府，完全是在扶余采购木料。运输时间，在封江垫

道，络绎运出。南西江沿，在冬季里，也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。在日俄战争后，大连港口已归日本掌握，日本化工原料（大豆）主要仰赖东北。三井、三太、三菱都在长春、大连设庄收购。扶余的航运事业也随之应运而兴。当时扶余共有帆船三百余艘。这时扶余不但是木材集散地，而且是粮谷集散的根据地，在扶余坐庄收购粮食单位“永衡官银号”永衡通达东省铁路公司（航商），由于外商收购，江北三肇、茂兴、头台等处都到扶余卖粮，因而给扶余商业带来了购销两旺的景象。尤其航运业，各船户，以及水手，在运费高涨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是两手辉煌（带的金戒指），腰缠累累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欧战爆发时，各国忙于战争，商业陷入停顿，航运业昙花一现的繁荣便随之萧条了。

二、风云人物范廷俊

当时扶余工商界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，既不是丰财殖货、腰缠累累的大商富贾，更不是“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”的文人仕绅，而是在旧社会被人所鄙视的一个屠夫！这个人的名字叫范廷俊，是山东武城县人。由于生计所迫，逃荒来到扶余。到了扶余以后，便和孙长义、路正方三人合伙开了一个屠宰铺。但是范廷俊这个人虽然胸无点墨，目不识丁，可是具有一付侠肝义胆、济困扶危的热心肠。有的人饥寒交迫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求到范廷俊，总是慷慨解囊，竭力相帮。他所周济的对象，即有劳苦又穷的穷人，也有游手好闲的懒汉，同时也有一些失势落落的散兵游勇。久而久之，范廷俊便在底层社会人流中，扎下非常深厚的基础。所以说，一个人能够青云直上，遐迩闻名，这都不是偶

然的事情。是既需有思想基础，又需有群众基础的，因而在社会活动中，才能得心应手，“左右逢源”。

当时社会上，最尖锐的矛盾，就是教民（天主教）和非教民之间的利害冲突。尽管天主教徒，对于舶来品的洋教，即不熟悉也不理解，但却有些人盲从，趋之若鹜，投入外国传教士的怀抱而信仰素昧平生的一个洋神。

起初信奉天主教的教徒，都是一些无权无势，劳而又苦的贫民，即有小商贩，也有小工匠，还有素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。他们一方面受到土豪劣绅的剥削欺压，另一方面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。在这些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只好投入洋人的怀抱，受到洋人的庇护。自鸦片战争后，由于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，请政府明文规定准许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。当时我正在耶苏教会读书，清政府布告抄件，迄今尚记忆一些：“前自六大国和约时，五大臣‘破斧沉舟’准许各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，飭令地方官严加保护，对于所有教民，自应一视同仁，以免出现歧视，致于咎戾，切切，此布”。

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，不但对于洋人严加保护，对于所有教民统在保护之列。这些天主教徒，过去所受的敲诈勒索，剥削欺辱，完全抛到爪哇国去了。因而天主教徒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阶层。事物的发展总是从一个极端，走向另一个极端。这些天主教徒，当他们“摆脱”了压迫和剥削后，便反过来以教会为靠山，以洋人为护符武断乡曲，横行闾里，对于非教徒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敲诈勒索，凌辱欺压无所不用其极，强圈土地、贩卖人口，包揽诉讼、霸占妇女……，所做的坏事，真是罄竹难书！地方政府有心干预，总怕扣上一顶仇教的帽子，更怕丢官罢职。因而只能视而不

见，听而不闻，听之任之。久而久之，教民和非教民之间，结成了深仇大恨，形成势不两立、不可调和的矛盾，这种忿怒的烈火当时已到了随时燃起的危险。

在光绪二十六年（庚子年），这种忿怒的火焰终于在山东燃起来了，以张德成等为首组织了带有神道色彩的义和拳（后改为义和团）。他们标榜的口号是“扶清灭洋”，杀天主、灭耶苏，有如燎原之势，使中国北方的大地，犹如地震一样大动荡了。当时的扶余也不例外。真是一夜之间风云突变，城市和乡村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义和拳，红灯照，由于大师兄已在北京设坛，地方政府已经瘫痪，只能袖手旁观，听之任之了。参加义和拳的成员非常复杂，既有小商小贩，也有地痞流氓，还有说评书拉大片的一些无产者。扶余县义和拳的首领，是一个叫“郭大噪”的说评书的艺人。义和拳里很多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都受过范廷俊的帮助，对范廷俊都有深厚的感情，有的叫三哥、有的叫三叔、也有叫三爷的。扶余义和拳兴起后，首先对天主堂和教民进行发难，把天主堂洗劫一空，对于教民进行了抄家，并在县内和苏家窝堡逮捕了一百零八口，大部分是妇女儿童，青壮年能跑的都跑了。义和拳对教民的处理，不用审问，很干脆，就是开刀杀头。范廷俊看到这场血腥大屠杀就要发生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挺身而出，与郭大噪进行交涉。范廷俊要求的条件是：教民的财产你们抄家或没收我是一概不管，但是一百零八口人，一个也不许给我动；如果动的话，先砍我范廷俊的头。经过几次交涉，一百零八口人终于得救了。这也为范廷俊在政治午台上，青云直上奠定了良好基础，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。

扶余经过这一次义和拳的大动荡，就杀死一个白神甫，其它教民都在范廷俊的保护下，度过了这场难关。中国的义

和拳运动，引起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，最后导致清廷赔款。扶余在教民赔偿问题上，是地方官非常棘手的一件大事。这时洋人和教民都在“辛丑条约”保护下，向地方政府狠狠敲上一笔竹杠。虽然见势天要价，可是就地无钱可偿。怎么办？顾知府也好，鄂州都统也好，都把范廷俊奉为座上客。这时候的范廷俊，已不是从前的范三了，连知府大人也都以三爷呼之。在给教民赔款中，范廷俊确实给政府出了一些力。大多数教民，对范廷俊都感有救命之恩，连洋神甫对范也有好感。因此范廷俊容易进入政府，虽然化了很多钱，总算把教民赔偿问题圆满解决了。这时范廷俊在县里更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了。

在辛丑和约后，联军继续从我国北方各地撤退，但帝俄军队拒不撤兵。主要是东北各地，因此引起了日俄战争。东北各地在清政府严守中立的幌子下，各地的政治和军事都瘫痪了。在光绪三十一年农历九月份，扶余两次被匪攻占。九月初三被“天下好”绺子先把扶余县城攻占了，经过大肆洗劫后才撤走；九月初九日，扶余县城又被张志镇匪帮攻占。当时的县城各商号，经过“天下好”匪帮的洗劫已元气大伤，很难满足张志镇匪帮的要求。这时扶余商会会长，是“隆盛号”财东经理王凤鸣，“隆盛号”第一经理是由家窝堡人由墨。张志镇把摊派现银的任务，就放在由墨、王凤鸣二人身上，由于数目太大，“巧女难做无米炊”，怎么办？只得请求范廷俊出面周旋。经过范廷俊唇到舌枪的交涉，总算达到力所能及负担的数目了。但是下边一些匪首，认为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仍迁怒在由墨、王凤鸣二人身上，在九月十二清晨，将由墨、王凤鸣二人五花大绑从“隆盛号”押至十字街（现在公安局广场），在地下铺上苇席，由、王二人头上勒上麻

撞，以便砍头时牵引，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人到西街肉铺飞报给范廷俊。这范廷俊踉踉跄跄飞奔十字街，并破口大骂。说什么：你们太不够朋友，你们要圆个的，姓范的不能给你们一个方的，现在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们要杀人先把我姓范的砍了！并娘长爷短地骂个不休。在群匪中，有很多人都受过范廷俊的救济，便向范廷俊道歉，赔不是，有的叫三哥、有的叫三叔：“你别发火了，我们放人就是了。”就这样、由、王二人算是保住了脑袋。可是由墨和王凤鸣已成惊弓之鸟，总怕事有反复，便在当日晚间在货客中，双双自缢而死了。这是扶余工商史上，最严重一次死难事件。由、王二人之死总算为维护扶余工商业者的利益而死，扶余工商界的人，是不会忘记他们两个人的。

这时，省里军队，将要兵临城下，张志镇匪帮只能提取和范廷俊所约的现银数目而匆匆忙忙撤走了。范廷俊虽然在扶余炫赫一时，也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但是他积累的财产并不算多。据一些老年人讲，他在小溪浪河有三十垧沙土地，在扶余西三家子有一所住宅，扶余西街路南，有十五间房子，和一个屠宰铺，另有两辆运输人车。这和他当时的名望及地方上的声势，就有这点财产，是不怎样相称的。所以如此，这和他好交朋友、挥金如土，是有一定关系的。特别是在那个年月里，盗匪如毛，遍地萑苻，交通梗塞，行旅绝踪，范廷俊凭借他的海交和社会名望，是吃得开，行得通，所以他的行车、南至吉林北至江省，在运输上是赚了很多钱的。他车上保镖的就是扶余妇孺皆知的酒颠李士望。李是范的表侄，在运输上是挣了些钱，但也是江里来河里去，大部分都做了有求必应。因此没有做到丰货殖财，腰缠累累。范廷俊在壮年时，男女孩都没有，因而过继了自己妻侄，原姓傅，过继